

在中国人眼里,他只是欣赏并保留纳妾、小脚、辫子等封建陋习的怪物和遗老,是清末民初集顽固保守、狂悖古怪于一身的封建卫道士。

在西方人眼中,他则是一位精通6国语言、沟通中外文化畛域、高论东西文明是非的著名中国学者,是片言解纷、妙语天下的幽默大师。

怪乎哉?怪怪也。

**引子：噫，怎就有了两个辜鸿铭？**

银行家，就是当天气晴朗时，硬要把雨伞借给你，而阴天下雨时，又恶狠狠地将伞收回去的那种人。

上面这则格言 怕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因为 几乎在每一部英文版的名言汇编，或中文版的外国名言大全之类的辞书中 都是随手可以翻得到的。所不同的是 在这句名言的末尾处 有些是将作者注为“佚名”有些则干脆含糊地注为“英谚”。不过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读者对此也并不十分关心。

然而 读者中也有认真留意的 并由此发现了一个例外 在一部出版于 1897 年 光绪二十三年 的此类名言汇编里面，竟于这条名言下确切明白地标明了它的作者：

Amoy Ku。

那么 这位 Amoy Ku 是谁呢？是位先生，抑或女士？其究为何国人士？又属于何种名流？

可是 在查遍了外文版的许多名人辞典之后 人们仍找不出这个人来！倘按音译，这位 Amoy Ku 当被译作“亚姆伊·枯”。但是，在中文版的各种外国名人辞书里，却仍然查不出“亚姆伊·枯”这个人来！

后来 很久以后的后来 有人无意间在一家外文杂志上，居然查到了此人。原来，在该刊所刊载的这位 Amoy Ku 的另一篇论文的末尾处，竟有编者对此公的简要介绍。略谓 亚姆伊·枯 名汤生 生于 1854 年 卒于 1928 年 著名中国学者 哲学家 思想家。曾将中国的《春秋大义》、《中庸》、《论语》等经典译成英文 云云。

至此 人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 这“亚姆伊·枯” 尚还原为纯正中文音译，应为“厦门·辜”。也就是说，这位

Amoy Ku 先生，即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晚清名士辜鸿生，亦即尝被世人目为“辜疯子”的狂士怪杰式人物辜鸿铭先生！

原来 这 Amoy Ku( 厦门·辜 )是他的英文名之一。

至此，想必人们定会生出不少的讶然之感罢！噢，原来 这条广为人知的“佚名”之“英谚”竟出自于一位道地的中国人笔下呀！尤其，它竟还是出自于那位素以顽固守旧、狂悖古怪见称的辜鸿铭的笔下！

啧啧！怪了，这可能吗？

可能。不仅可能，而且确实。至于人们有见怪之感，倒也不能说是不正常。毕竟，这世上人间的种种事物，多是按常态发展和演进的。不过，稍一转念，这大千世界嘛，本来就该无奇不有。不然，这世界又哪有许多的色彩和情调？

辜鸿铭 名汤生 鸿铭是他的字。像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大人物和名流们一样，辜鸿铭氏亦终生以字名于世 以至于很多人均不知其“汤生”之名 更遑论其英文名 Amoy Ku 了。原来 辜氏生于南洋马来亚 其“汤生”之名 系 Tomson 的中文音译 其“辜鸿铭”全称之字 少时在南洋亦被通呼为 Koh Hong Beng。其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的注册名为 Hong - Beng Kaw 这些，同纯纯粹粹的中国人多少还是有些区别的。又 辜氏之祖籍 为福建省同安县。按清末中国行政区划，厦门地方属同安县辖（今 同安仅为厦门市之一郊县）以是之故 后来 辜鸿铭每以英文发表各种文论或著述 多以“厦门辜”自署之。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时及近代，各种官员及文人雅士 均有以自己的官衔、属地、祖籍或出生地自署或互称

的习惯。如人们较为熟悉的西汉政治家贾谊因曾做过长沙王太傅，世人则称之为“贾长沙”。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因官拜大学士，时人乃径呼其为“苏学士”。又如晚清政治闻人康有为，因生于广东南海县，遂被人们尊称为“康南海”。

辜鸿铭在南洋时的 Koh Hong Beng 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的 Hong - Beng Kaw，用的还只是其字号的英译。而包括此处及此后的所谓 Amoy Ku，便依了中国人以出生地自署的惯例。不惟如此，这在他，怕还是别有一番深意在——越到后来，随着他对中国传统和儒家文化的皈依，在英语世界的一切声音和行止，他都愿意明确自己的身份：一个中国人，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

至于其中文音译“亚姆伊·枯”，因不是中国标准的官话或普通话，而是闽南话之英文音译，所以才发生了上面的讹误。如此说来，也就难怪前面提及的那些中外名言大全或汇编之类辞书的编者，大多搞不懂这个 Amoy Ku 究为何许人了。

此外，请允许在此顺便指出，上面说及的那家外文杂志，在“作者简介”里对辜氏的介绍，尚有两点不确之处：其一，辜鸿铭的生年应为 1857 年，而非 1854 年；其二，所谓《春秋大义》一书，并非如英译《论语》、《中庸》等，为辜氏所潜心译的中国儒典之一种，而是辜氏用英文写作的一部专著，其直译名为《中国人的精神》。是著，尝被推为辜氏最力英文之代表作。

晚近以来，关于辜鸿铭其人其事，在国内曾有着颇为广泛的流传与闻说。凡是认识或听说过他的人，不论直接间接，知深知浅，或褒或贬，或毁或誉，大多能够讲上一段他的轶闻趣事，学说一通他的奇谈怪论，或来娱人，

或以自娱。这种情形，几乎使辜鸿铭成了近代中国的士林一绝。总之，在昔在今，国内学界坊间，不知道辜鸿铭其人其事者，着实不为多也。

那么，辜鸿铭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呢？更何况，谁都知道，在晚清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他既非政界权要，亦非商界大腕，更非演艺界明星。

是的，倘论这些，他确实是既不搭界，也够不上。但是，有一处却被他占上了，这便是文化界。他是一位文化人，一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甚至可以说，他尤其是一位声名远播于欧洲和世界的中国文化名人！

不过，单凭这一点似乎还不够。因为，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并享有驰誉海内外之赫赫声名的大师级学者名流，自然不会是只他老先生一个，而且就声威德望诸方面情形排列起来，他怕永远也排列不到名列前茅、家喻户晓的位置上。

既然如此，那么，他的出名所靠的到底是什么呢？

说来极其简单，顽固、保守、狂悖、古怪。

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地道十足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在思想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在生活上，他则是一个疯而狂之的“疯子”，一个奇而怪之的“怪物”。

关于他自己，辜鸿铭也有一番经过刻意“微缩”加工的夫子自道：“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由此，他还经常不无谐谑地振振有词说：“不但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本夫子也算得上是独特的一个了。我是一个标准的‘东西南北人’。”

对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辜氏自己的这种说法，表面

看起来，好像只是文学语言之调侃，然揆诸实际，却是确切历史之写真。

辜鸿铭长达 70 余载的一生，仿佛就是在讽时骂世、调侃人生之中度过来的。他绝对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敢恨敢爱，敢怒敢言，尤其敢作敢为。他性素好辩，喜戏谑，善调侃。举凡世相人生，周围左右，无不尽在他的嘴端笔下，被颠过来复又倒过去地任情演绎、挥发。

就是自己的姓氏，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来调侃。他曾说：“敝人所以姓辜，必是因为始祖犯过大科、作过大奸，故而罪有余辜。”但随之话锋一转，又说：“不过，这在我倒也不足为羞。祖之为祖，我之为我，盖古来天经地义之事耳。如真个数典忘祖，则为真可耻也。”

在新近出版的两卷本《辜鸿铭文集》中，有著名文化史家龚书铎教授所作的一篇序言。其中，关于辜鸿铭的古怪情状，龚先生曾作过如下一番简要的描述与评论：

辜述铭是清末民初的名人，“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以“古怪”著称于世。他的轶闻趣事，奇谈怪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广为流传，死后则更加扑朔迷离，平添几分神秘色彩。凡是认识他的人，听说过他的人，不论知深知浅，或臧或否，无不以“古怪”目之。林语堂誉之为“怪杰”，胡适称他是“怪物”，周作人则说“北大顶古怪的人，恐怕众口一辞地要推辜鸿铭了”。

辜鸿铭的确是“怪”。他 1857 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祖籍福建同安，名汤生，以字行世，自号汉滨读易者、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东西南北人。13 岁到英国留学，20 岁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继而又到德、法、意等国游学，取得莱比

锡大学土木工程学文凭。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邃于西学西政，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

然而，辜鸿铭归国后入张之洞幕府，即倾心于儒学文化，并且日趋保守，以致清朝覆亡后仍拖着一条辫子，并对公认的“国渣”如小脚、辫子、纳妾、八股文等都不同程度地加以赞赏和辩护，令人不可思议！因而留给世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要举出近代中国最顽固落后的文化人，也就非辜鸿铭莫属。<sup>①</sup>

其实，辜鸿铭之“怪”，倘套用一句俗话来说，则正可谓“怪可怪，非常怪”。

这里，我们可将此语解析为两层含义：其一，他的怪，是极其怪、特别怪的，甚至可以说，简直是怪得很，怪得出奇，是为“狠”怪也；其二，他的怪，是非同寻常且别具一格的，一般之常人，皆不可与其比肩。尤其怪思想和怪行为，一般常人根本无法企及，无使出其右者。

作为晚清名士，或者说是清末民初曾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但在中国本土却并非如此——大放异彩的中国文化名人，辜鸿铭身上表现或散发出的那种“古怪”，也可分成好多种情形：有的是毫无道理的为“怪”而求之于“怪”，或竟是像孩子般的恶作剧，他自己甚至还时常为此而自鸣得意；有的应该说还是蛮有道理的，即那种极富文化韵味，颇为别致典雅的“怪”，而这又多属于常人所不能由出或无由感发的；有的则由于外人先见怪并苛责于他，他遂以一种逆反心理作与世抗争，因之更加使性放言，故作怪论，以示其睥睨一切之疏狂。

龚书铎：《辜鸿铭文集 序》，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以下简称黄等译本）上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辜鸿铭的“古怪”给人们的感觉，有时像是一种智慧的展示，或只是一种才气的游戏，有时完全是一种逞能逞性的好辩，甚至是强词夺理的曲辩和诡辩。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则纯粹就是令人啼笑皆非、不知所云的牵强比附和东拉西扯。

因此，在相当多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他是一个孤品、诡行的“怪物”，一个狂放不羁的“奇才”。诸如他那愤世嫉俗、讽时骂世的狂狷、庄谐并出、嬉笑怒骂的犀利、片言解纷、妙语天下的机智，都不免使人们要对他或则侧目以视，或则刮目相看。而举凡这些，因其迫人魅力所在，又往往会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趣话与谈资。

然而，一旦论及辜鸿铭的社会评价和政治定位，他似乎变得一无是处了。无论生前身后，人们更多的只是将他与顽固守旧、保皇复辟、抗衡进步、忤逆时代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的语汇联系在一起。在晚近国人的眼里，他不过是亡清朝廷之“遗老”、辫帅张勋之“同路”，而更是反对革命、对抗进步的“逆子”，立意要与一切新时代、新潮流相抗衡的“疯子”。

还在他在世的时候，辜鸿铭便被人们视为时代的“弃儿”，而越到后来，他似乎越被日渐进步的社会所远远抛开了，几至大有被抛出历史之外之势。若谈起他同时代及历史的隔绝情形，人们不但不会寄些同情给他，反而还会不期然地把这样一些名句送给他，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

即使是现在，一提起辜鸿铭来，更多的中国人，怕只会不约而同地记起他诸如认为男人纳妾为“天然合理”，女人缠足“远非虐政”，谬赞慈禧太后为“中国最伟大之女

性”胡论随地吐痰为国人“注重精神生活的表现”等等的奇谈怪论来。尤其，人们的脑际眼前首先映现出的，恐只会是他那副至死仍拖着一条稀疏小辫子的突梯滑稽、不伦不类的怪模样来。

总之，在中国，辜鸿铭留给人们的印象，或者说人们对他的了解和认识，怕也仅止于一个异常古怪的“怪物”，一个顽固不化的“遗老”，一个忤逆时代的“疯子”。一言以蔽之，整个儿一个顽冥乖劣的封建卫道士！

或许，这就是辜鸿铭在多数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但是，在欧洲，辜鸿铭的形象则是另一个样子。

甚至可以说 在欧洲文化界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里 这位中国的辜鸿铭，却是个十分惹眼的了不起的人物。他的确是闻名遐迩和大名鼎鼎的，以致一提起其 Hong - Beng Kaw 或 Amoy Ku 之名 或他自署的那个“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 很多人都不免肃然起敬。

自近代以来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欧洲学术界及西方社会一直认为 这位中国的辜鸿铭先生 是一位足踏东西文化 既谙熟西学西政之精要 又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三味的著名学者，一位在近代中国极为少有的识见通达、独到深沉的有识之士。

或许 人们不禁要问 这又是为什么呢 说起来 当主要是由辜氏著述影响所致。较具体地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在当时 辜鸿铭凭藉着同时代人所鲜有的文化结构上的特出优势，对中外文化之优劣及东西方文明之是非等问题，做了大量有力的评鹭与判别工作。他在这一工作中表现出的种种真知卓见和每每游刃有

余 尝使西方学界殊感敬佩 大为倾倒。正是由此 他震惊了西方社会 并一度驰誉欧洲 走红西方 极享一时之盛名。

这项工作落后的东方人所不能力任的，甚至东方人干脆就不配来做它。既然如此，他们那种历来骄傲自恃、目空一切的心态 在辜鸿铭的缜密思辩和激扬文采之下 终于不得不折服了。其实 在理论意义上说 这也正好是西方人长期以来轻视、歧视东方人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结果。

当时 竟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在欧洲以及以英语为主导文化语言的西方社会里 特别是在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化界 人们尝以为 辜氏乃是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学者 包括到后来 他们甚至把辜鸿铭高视为一位绝对具有理性思辩穿透力的思想者，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

第二个方面是 作为一位才气横溢的学者 辜鸿铭还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翻译家。而这一点，则正是国人长期以来所不知 或知之不详的。他以他那独具的“鬼怪式天才”肩负起了“中学西传”历史重任 而且做得颇为老道、成功，以致被西方人目为中西文化与东西方文明最力与最佳的沟通者。

早在百多年前的 19 世纪末叶，正是辜鸿铭那兼具“信达雅”三色的英译《论语》、《中庸》等中国儒学经典，第一次使代表着东方古老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既不失其原汁原味、又以易于接受的新式包装 摆上了挑剔万般的西方人的精神餐桌，从而使之代替了长期以来由来华传教士所译造出的赝品式中国吃食。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西传之事，一直是由来华传

教士所独揽包办的。由他们向西方世界所提供的那种生吞活剥 甚至是南辕北辙式的中国文化经典 虽不能说对沟通中西文化畛域不无益处 但在一定程度上 也着实妨碍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一点，于今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有比较才有鉴别”。经此两相对照 西方有识之士，对于辜鸿铭的这项工作及其卓越成就极表欢迎，甚至誉其为“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辜鸿铭始终相信这一点 如果这东西是好的 那么不管是使用刀叉的人 还是惯于使用筷子的人 感觉都应该是相同的。因为 其价值和味道并没有改变，而改变的只是进食方式。

在此一意义上 对 19 世纪以后的近代西方思想界来说，其真正地了解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 尤其体认到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宏富妙意 确是始于这位辜汤生天才般的翻译和介绍，尽管这时他的中国同胞们 对他本人和他所从事的这一极富意义的工作 还有着相当的隔膜甚至误会。

第三个方面在于，在那风雨如磐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辜鸿铭曾自觉地担负起了中国人“在英语世界的发言人”的职任。当然 这是指民间而言的。

彼时的中国 正在遭受着西方列强肆无忌惮、明火执仗般的欺凌。倘借用马克思的学说来分析，这无疑是一种民族间的压迫，一种阶级间的战争。在中国 时人则只是简单地谓之为“千年未有之强敌”；“千年未有之变局”。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昏聩无能的晚清朝廷 及为数相当多的权臣和官僚们 率皆始以“畏洋如虎”继又“事敌若父”，在强权的洋人面前连大气儿也不敢多喘一下。而在中国广大民众中间 虽屡有可歌可泣、前仆后继般英

勇反抗之行为 但因语言文化的隔膜 他们诉诸口笔及据理呐喊的正义之声，却苦于无缘传达至列强所在的西方英语世界。

在这种条件下 正是这个深谙西学西政的辜鸿铭 起而对西方列强加诸给中国的炮舰政策和铁血外交，对西方来华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合法地帮助其政府从事侵华活动的劣迹 给予了义正辞严的大胆揭露。同时 对某些西方学者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及加诸给中国人民的民族歧视，也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激烈抨击。甚至 作为“慈禧太后的义务律师” 他还为晚清朝廷和西太后作出了种种迹近诡辩的护卫性辩白。

所有这些 在相当的程度上 则赢来了西方社会对他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的特殊尊敬。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在中西关系问题上，整个英语世界几乎一直是侵略者自己在那里充当舆论主角并自说自话。现在，终于有了一种直接来自于那个正在遭受着欺侮的国家的异样的声音——它是那样大声疾呼的抗议，又是那样据理力争的抗辩！

正是缘于上述之种种般般 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 才不得不对辜鸿铭抱以敬佩。

在当时乃至以后的一大段时间里，辜鸿铭氏在西方已经“热”到了如此的地步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与他建立起了通信联系；英国知名作家毛姆访华时想方设法一定要去拜晤他；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十分乐于与他倾心交谈 法国的罗曼·罗兰、瑞典的勃兰克斯、德国的纳尔逊、日本的萨摩雄次以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许多世界名人，都对他抱有相当多的好感。

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他简直受到了一

个中国人所能享有的空前绝后的礼遇和推崇。莱比锡大学、哥廷根大学等高等学府专门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辜鸿铭俱乐部”。他的一些著作还被某些大学当成了讲义和学生必读书。有的教授声称，他读辜氏著作已经十数次了，然每有新意，流连忘返。更有甚者，竟公然要求学生说：如不懂辜鸿铭，就不要参加他主持的讨论。

可见，在西方社会，辜鸿铭的形象与前述他在中国国内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这里，他颇有市场并大受欢迎，被人们视为古老东方文明的代言人。在西方人的眼里，他同印度的泰戈尔一起，被奉为“东方之圣哲”。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作为一个学者、智者和贤者而出现的，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自然，这是不同的观察视角使然，同时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即使到今天，在欧洲及西方学术界，仍有不少学者在做着辜鸿铭的专题研究……

请看，这是两个多么悬殊的辜鸿铭啊！

那么，在他自己所热恋并挚爱的祖国和他所不断批评并抨击的西方之间，辜鸿铭的形象何以有着如此殊大而强烈的反差呢？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谜。

不过，这也刚好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谜样的人物。

显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是多方面而极复杂的。本书的主要任务当然不是对此一问题作详尽全面、条分缕析的理论阐释和历史考察。这里，且允许我们仅就其

荦荦大者 简单地举证若干 并稍予说明——

第一，辜鸿铭出身于华侨世家，童年是在南洋度过的，其青少年时代又长期学习并游学于欧洲，即使在其决然返国服务之后，又曾在香港逗留多年，一直到 1885 年 30 岁之际，他才真正地踏入了祖国大陆的土地。也就是说，在他而立之年之前，如同他很少了解自己的祖国和文化一样，国人对这大段时间的经历及活动也知之无多。

坦白地说，即使到今天，这种情况也未能发生令人满意的改变。如欲求此改变，只能期之辜氏更多的早年外域史料有更新的发掘之一途。如是，人们对他的全面认识和进一步研究，乃始或有可能。

第二，作为有清以来一代文化名人，辜鸿铭之一生，多以英文撰述并在外域发表作品，可以说这是他“立言”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他用中文写作并出版的著述，总共只有《张文襄幕府纪闻》和《读易草堂文集》两本小册子，又兼刊本较早，数量极少，因而影响有限是可以想见的。至其大量的英文及其他外文著述，绝大多数国人则长期无从寓目，自然也谈不上全面而充分地了解和理解了。

自然，这也和辜氏的“工作性质”有关。与他同时并称近代“中国译界三奇才”的严复和林纾——说来也怪，他们三人竟同为福建人，这一现象本身亦蛮有文化意趣——主要是将西方思想学说和文学艺术介绍到中国来，因而国人对他们两位的大名和成果，既闻之早，且见之多，几至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相反，辜鸿铭的工作主要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介绍给西方，这便导致了他在国外的声名远远大于国内的情形。正所谓红杏出墙，花香域外。

第三，在包括辜氏生前身后这大段极为漫长的时间

里 他的英文及其他诸种外文著作 国内始终鲜有译本问世。在 80 年代，武汉一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辜鸿铭文集》，但它基本上未收入辜氏的任何外文著述或译品。直到 1996 年，海南出版社才印行了一套以辜氏外文著述为主体的译作性的《辜鸿铭文集》 它分为上、下两巨册 70 余万字。这是目前较为完备的本子。

可见 在辜氏的真面目和国人对他的认识之间 这当是多么巨大而长期的历史隔膜啊！自然，这也极大地妨碍了国人对他的全面认识与科学评价。

第四，也许有必要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在国人脑中，长期以来积之已久的对辜鸿铭的那种‘先入为主’的定型化认识观念，以及百多年来广泛流传于学界坊间的关于辜氏的种种不确之论，也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加大了其以讹传讹的影响。自然 在这方面 作为一代名士的辜鸿铭本人，也负有相当大的历史责任。

当然 除上述之外 造成中西视野中的‘两个辜鸿铭’现象 也有中西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必然的仁智互见 东西方社会不同的时代需求，及其彼此历史认同基点的差异等远因。

但是 不论是何种原因 在中国和西方有着形象如此悬殊的两个辜鸿铭其人，肯定是不符合历史真实和事理逻辑的，因而也是极不正常的。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 真实的辜鸿铭只有一个 即他本人那个独特的存在。此外 想必还有其他种种。譬如 其中最为直接的一种便是，人们普遍地希望看到一个真实、全面而完整的辜鸿铭形象：一个以博富的中西文化底蕴为其内在核子 以睿智诙谐、好辩善骂等古怪性情为其外在表征的晚清名士。

一句话，人们希望看到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那个辜鸿铭的全部。

应该说，人们的这种愿望和要求并非奢求。

在理论上，相信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辜鸿铭，原系南洋马来亚侨民后裔，祖籍福建同安。名 Tomson，即汤生，号立诚，鸿铭为其字。自称“情人”，或署“汉滨读易者”。晚岁又号“读易老人”，常自谦为“冬烘先生”。英文名 Hong - beng Kuh，亦称 Amoy Ku，或署“一个中国人”、“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

因其有“生于南洋，学在西洋，娶于东洋，仕在北洋”的传奇式浪漫经历，故又尝自命为“东西南北人”。

## 华侨身世 负笈欧土